

The Issue and Resolution of Grassroots Cadres' Shirking of Work During the Land Reform and Party Rectification in Lucheng from 1948-1949

Hongqin De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dhq@sxu.edu.cn

Weiqiang Ma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maweiqiang@sxu.edu.cn

1948-1949 年潞城土改整党中基层干部的躺倒及解决

邓宏琴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马维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Abstract: Contrary to the existing academic consensu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hifted from strict purges to more lenient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paralysis and other negative impacts on its cadre force during the land reform and party rectification,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process of addressing the pessimism, negativity, and work-shirking of cadres was not as simple as “education,” but rather a relatively difficult journey, with historical realities proving to be far richer and more complex. In face of the severe problem of cadre work-shirking during land reform and party rectification, the CCP gradually forme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While acknowledging mistakes,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striving to win back the cadres, the party also endeavored to eliminate ideological confusion, delineate right from wrong, and deal decisively with opportunists. For grassroots cadres, this also represented a transformative improvement adapted to revolution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cadre work-shirking highlights the wisdom and courage of the CCP as it confronted the negative impacts produced by miscalculations during land reform.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party's internal a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needs to vigorously develop production and achieve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war" to "peace."

Keywords: Lucheng, land reform and party rectification, grassroots cadres, work-shirking

摘要：与学界已有的土改整党中中共面对干部队伍的瘫痪及其他消极影响，由严厉整肃转向和缓教育的定论不同，本文认为对于干部的悲观消极和躺倒离职的解决过程非“教育”那般简单，而是相对艰难，历史现实要远为丰富和复杂。面对土改整党中干部躺倒的严峻困境，中共逐渐形成对于局势的清晰认识，在承认错误、明确责任、努力挽回干部的同时，也从思想根源上澄清混乱、明确是非界限，并对投机分子予以打击处理。对于基层干部而言，这也是适应于革命和社会发展及变化的改造提升。干部躺倒问题的解决，彰显出中共面对土改判断失误、“压”党而非整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而力挽狂澜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其努力发展生产、实现由“战争”向“和平”平稳过渡的内在诉求和现实需要。¹

关键词：潞城 土改整党 基层干部 躺倒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抗战时期双减双交的土改政策改为彻底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党看来，干部的贪腐及思想、作风、成分不纯等问题导致土改不彻底、贫雇农翻身不彻底，因此需要对干部进行整顿。各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普遍开展土改整党运动。在1947年10-1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冶陶土地会议后，太行区及下属各地委分别召开党委会议，并于1948年2月下旬派驻工作队进入村庄进行土改整党，太行三地委下辖山西潞城五区的张庄村即在此时迎来上级工作队，韩丁也正是由此进入张庄参与土改工作，并写就了影响广泛的《翻身》。

¹ 本文提到的基层干部主要指县级以下的区级干部和村庄干部。其中，区干部大部分来自潞城本地的村庄，他们在作为工作队员身份参与其他村庄土改整党的同时，也要回自身的村庄接受审查。关于村庄土改整党的具体情况及村干部、区干部的参与实践可参见马维强、邓宏琴（2018）：《土改的试点与试点的土改：山西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研究》，《开放时代》第5期，第43-65页；马维强、邓宏琴（2021）：《山西潞城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反“左”纠偏与建党建政》，《安徽史学》第5期，第113-120页。

土改整党开始后党员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悲观消极，被停职、被处分甚至被劝告回家的受到的打击更大，心情恐慌压抑。许多干部思想发生较大波动，一些人躺倒离职，甚至表态“死也不干”，形成了巨大工作困境，这在潞城乃至太行区都成为严重问题，其中又以县以下的区级干部最为突出，“区干部感受的压力最重，处分最多，调动最大。”“压力越大处分越多的地区，区干部躺倒的越多。”¹韩丁在《翻身》中对于基层干部的消极情绪也有关注，但未能注意到干部躺倒已形成威胁中共基层政权的严峻局面，并由此低估了整党给中共干部管理带来的更为深刻的消极影响，以及其时革命发展、转折的复杂态势和中共所面临的艰难挑战。

就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黄道炫先生的成果最有代表性。黄先生对土改整党的研究同样注意到了干部队伍的瘫痪以及农村干群矛盾、宗族、私仇的激化，认为中共中央基于此对运动进行反思和收束，由过于激烈的整肃、处分打击向较为温和的教育方式转变，干部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和依靠，中共的干部管理似乎由之前的“左”倾向正常的轨道回归，“后期整党更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和组织教育，即所谓教育从严、处理从宽。”²但事实似乎要更为复杂。干部躺倒的严峻困境成为其时中共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其解决也更为艰难。中共并不停留于以已经取得成绩作为政策突然扭转、整党“戛然而止”的借口或依据，略显简单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亦不能化解困境³。而且，若仅停留于“教育”的方式，在中共看来，无异于“取消整党”，并有可能陷入更深的合法性和信任危机。

事实上，基层干部从被信任、被依靠到被厌恶、排斥，再到被“挽救”，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回归，看似简单，实则社会影响巨大。破镜重圆有时只是幻想中的美好，简单的反复其实可能已经变幻了沧海。当中共意识到运动的“左”倾偏向，开始做出反“左”纠偏的调整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尤其是与上级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充满着更多对抗性的矛盾冲突，对中共的干部和社会治理提出严峻考验。

一、干部的躺倒

在1947年10-12月晋冀鲁豫边区的冶陶会议上，中央局提出土改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的论断，对于土改不彻底、干部问题严重形成一致意见。大会旋即展开查阶级、查思想运动，并对太行等四个代表团1169人中933

¹ 陶鲁笏：《目前干部问题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48年10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2013）：《陶鲁笏文集》（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9页；《中共太行区党委1948年综合报告第4号》，（1948年8月26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1996）：《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376页。

² 黄道炫（2007）：《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第4期，第89-110页。

³ 黄道炫（2013）：《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近代史研究》第3期，第27-43页。

人作出结论，家庭成份是地富的占到 53%，中农 24%，贫雇只占 18%。¹此次会上太行区县级以上干部有 134 人被认为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占参加会议人数的 50%，并最终对 34 名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进行了纪律处分。²在太行区党委行署干部大会上，农民干部被认为大部分是新翻身农民，由于受到地富影响及自身弱点，产生了忘本思想、土皇帝思想、贪污蜕化思想等地富思想观念，以及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行政命令作风。³在 1948 年 2 月太行三地委召开的鹿家庄会议上，潞城全县参加整编的干部包括区级干部共 178 人，共有 52 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⁴整个太行区干部整编从 1948 年 1 月 10 日开始，2 月 24 日结束，6531 人参加，受处分 1617 人，占参加整编的 24.7%。⁵村庄一级的党员干部则在工作队干部进驻后受到整顿。也即，自边区一级，至县以下的区级干部和村庄干部都参加了此次整编。

从土改整党基点村的情况看⁶，开门整党后的村庄党员干部受到的打击较重，思想压力较大，他们不仅需要检查自身的思想、作风，而且要承担“土改不彻底、贫雇翻身不彻底”的责任，⁷更有甚者遭到群众的捆打扣押，有的村庄即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手段。⁸村庄干部普遍悲观消极。

与村庄干部相比，一些担任土改工作队工作的区干部因离职回家而使干部躺倒现象更为严重和明显。许多工作队干部参加了地委鹿家庄整编后，又在自身所在村庄接受整党审查，许多人在此时即已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被批评、质疑、责问和处分的区干部受到的打击更大。尽管县委提出，参加了鹿家庄整党的干部在支部整党时不回去，只到人代会上接受审查⁹，但一些干部事实上在村庄开始整党时即已回去参加了审查。张庄在区上担任干部的师福元、张天明等即是在回家时被土改工作队扣押，被要求“交清手续”。

鹿家庄会议后，有些干部被调往中央局进行离职学习，当时计划调动 21 人，就有 12 人等不服从。¹⁰到五月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前后，回家的干部已达 32

¹《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干部大会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第六号）（1948 年 1 月 10 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91）：《河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第 43 页。

²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1983）：《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中共山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出版，第 360 页。

³《检查思想作风 严格整顿队伍 太行区党委行署干部会结束》，《人民日报》1948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

⁴《（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潞城市档案馆藏，档号：A1-1-402。以下档案若无特别说明，均收藏于山西省潞城市档案馆，仅标注档案号。

⁵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1983）：《太行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述》。中共山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出版，第 366 页。

⁶潞城全县共 164 个行政村，开始指定 19 个村庄作为实验基点村，后来根据地委指示，需要抽出一部分干部指导生产，缩减为 11 个基点村。

⁷关于村庄干部的消极状态详情可参见马维强、邓宏琴（2021）：《山西潞城土改整党试点的反“左”纠偏与建党建政》，《安徽史学》第 5 期，第 113-120 页。

⁸《第二期全县村干部训练总结》（1948 年 10 月 18 日），A1-1-249。

⁹《陈振华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48 年 4 月 28 日），A1-1-438。

¹⁰《（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人，其中区委级干部 9 人，一般区级干部 23 人。¹当时“各区工作的一般在五到六、七个人，顶多十个人”，²“有些区只很少数人在岗位上坚持工作，各区的骨干同志和县区的领导承受着较大压力。”³干部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出来。

六月县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会议前共回去 62 人，从级别来看，区委级干部 11 人，一般区级 51 人”⁴。会后“个别区仍有不少区干部自由回家（说让回也得回，不让回也得回）和有随便不干的現象，又回去 37 个，并散布失败情绪、发展自由主义”。⁵截止八月扩干会议，潞城县前后回家共 99 人，若加上整编前回去的 23 人，共回去过 122 人，占在职干部总数 239 人的 51%，情况不可谓不严重。当时“区上人少任务繁重，村庄混乱，工作无法进行下去”。⁶经县委努力，七、八、九月被劝回工作岗位的干部 39 人，脱离工作岗位的仍达 83 人。⁷

十二月抽干部北上时大部分干部不服从调动，各区尤其一二区干部散漫状态严重，“随便不请假自由回去，想住多长时间便多长，区开会不参加，假装病回家，开会不到，到也是说二话……一调就垮台”，而“二区又是严重中的严重”。⁸一区二十五个干部中坚定的只有九个，而且被孤立着，不坚定的干部常在一起闲谈乱扯，散布悲观论调，“干一天说一天”成为一区干部的普遍思想。区委调十个村干部吃躺倒区干部的粮食补贴，以帮助结束土改，但参加第一批结束土改工作的村干部仅剩三个，到第二批结束土改工作开展时仅剩一个村干部，也回家没有再来。区委因此害怕上级调动干部，因为“调哪一个都困难，这一个不出，那一个亦不去，而干部思想被动了或躺倒了将又增加工作困难。”⁹

在张庄，工作队长侯宝贝在六月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之前已经告假回家照料庄稼去了，取代侯宝贝的是蔡勤。张庄的三个脱产区干部师福元、张天明、赵贵才都在家，而不是在工作岗位上。村庄在风言风语地乱传，说他们不干了，因为觉得没有前途；原张庄工作队的侯宝贝和李文忠永远回不来了，因为这些人对党和政府的脱产工作看不到希望。韩丁认为这些传闻不符合实际，侯宝贝和李文忠并非离职，而是回自己家里收割小麦，师福元也是为了这事，张天明有病修养在家，一旦恢复健康就马上回去工作，只有贵才闷闷不乐，对外面的工作感到失

¹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² 《潞城县秋前结束土改工作给地委会的报告》（1948 年 11 月 1 日），A1-2-658。

³ 《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 年 2 月 27 日），A1-1-267。

⁴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⁵ 《潞城县秋后第一批结束土改总结报告》（1948 年 12 月），A1-2-651。

⁶ 《潞城县秋后第一批结束土改总结报告》（1948 年 12 月），A1-2-651；《（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当时全县编制干部 278 人，实有干部 239 人。参见《（潞城）八月县区扩干会给地委的报告》（1948 年 8 月 29 日），A1-1-208。

⁷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⁸ 《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 年 9 月 10 日），A1-1-1091；《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 年 2 月 27 日），A1-1-267；《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 年 12 月），A1-1-1311。

⁹ 《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 年 12 月），A1-1-1311。

望。¹师福元、张天明是五区漫河流工作队的成员，赵贵才是贾村土改工作队的成员。事实上，师、张二人都因工作队开始整党查账时被扣压、被追问斗争果实情况且通过发动地主展开调查的极端方式而恐惧和懊恼，认为自己被当成特务，是让地主起来翻身算账。张天明“后悔自己不该参加党当积极分子，否则不会有这些事情，自己死活不说还连带家庭，存在当个落后分子、退休的想法，担心家里没人劳动，怎样也会分得一份果实，对工作的态度是弄成什么算什么，退果实、接受错误都行，只是不同意发动地主、和地主对口。”师福元同样心痛不已，存在退休想法，认为“从前当村长造下罪恶，现在不如特务地主，可恨张天明当时不该介绍入党”²。这是潞城干部问题在张庄的具体体现。

这种情形在三地委所辖各县中也属较为严重的，“地委了解潞城躺倒非常厉害”³，在潞城县也是“干部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次”⁴。潞城干部问题也是整个太行区干部问题的一部分。在太行区，“村干党员普遍躺倒，一般区以上干部表现消极苦闷，抵抗纠偏，埋怨领导。……至八月会议之前，大部区村干部的思想和情绪尚未完全解决，回家现象未有停止。自整编到七月底，区干躺倒回家的全区就有 888 人……。全区区以上干部参加整编的共 8000 多人，受到处分的 1800 余人，占整编干部总数的 22.5%，其中被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人员占受处分干部约三分之一。”太行区党委认为虽然多数干部是应该受到处分的，但以非为是、以轻为重处分不当的情况相当严重，有半数左右是不正确的，有些是根本不应该处分。⁵截止到 10 月，太行区躺倒干部中回到工作岗位的不足 200 人，其中 60%左右是由于受处分或受“左”倾偏向的影响而消极躺倒。⁶

二、整党打击与严格要求

应该说，整党打击是形成干部躺倒局面的直接原因。⁷一些受处分的干部“对党有些离心，有机会即发牢骚，还时常影响（其他）一些干部，有传染病，虽然不很严重，但党内客观上确有反对派存在，没有头。”⁸就村干部而言，这种打击

¹ [美] 韩丁（1980）：《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第 607-608 页。

²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潞城县漫流河工作组过党日记》（1948 年 4 月 27 日），A1-1-703。

³ 《县委会过党日记》（1948 年 10 月 28 日），A1-1-124。

⁴ 《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 年 9 月 10 日），A1-1-1091。

⁵ 《给华北局组织部的工作报告——关于华北局七月会议以来的干部工作》（第三号）（1948 年 11 月 5 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党的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 516 页。

⁶ 陶鲁笈：《目前干部问题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48 年 10 月 25 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2013）：《陶鲁笈文集》（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59 页。

⁷ 太行区党委认为，在打击干部致使干部消极躺倒问题上，除了此次整党外，“四三年审干以来，保留着的政治嫌疑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整编中又稍增加了些，现在全区共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扩大化的错误更为严重……使党内是非好坏的界限混淆不清，而严重地影响着干部的情绪和干部的团结。参考太行区《给华北局组织部的工作报告——关于华北局七月会议以来的干部工作》（第三号）（1948 年 11 月 5 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党的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 511-512 页。

⁸ 《赖若愚在区党委机关干部会议上关于太行党工作传统及今后工作问题的讲话》（1948 年 10 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党的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 509 页。

一方面来自工作队进入试点村庄后排斥打压的整党态度和方式，另一方面来自村庄贫雇农的反干部行为及报复倾向。不可忽略的是，在试点阶段一些非试点村庄也闻风而动，成立了无工作队领导、无群众基础、以斗争干部为主要目标的假贫农团，趁机钻空报复干部，加重了对干部的打击。

各级党组织在中央4月发布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开始纠正偏向，陆续提出土改已经完成的指示，并肯定基层干部的能力和成绩。村干部思想压力虽有所减轻，但更多的是因自身受到错误的打压而委屈懊恼，也因发生偏向的责任归属及被要求公开认错纠偏而抱怨，“啥事不是上级让做，区干部在下边督促的？现在都弄得不对啦。”“错斗中农还得向人家承认错误哩，追三代划成分不是上级让那样干的？反正是该村干部倒霉吧。跟上共产党这几个字就算是倒了霉啦，要不是跟上这咱也是个老农民。”村干部对县委是否能秉持团结而非抛弃、教育而非打压、分清是非轻重、为公为私而非一律排斥的整党纠偏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县委的自我检讨是在给村干部“灌米汤”，是因为生产不起劲来给村干部打气，“在区开生产会时让发牢骚，最后吃了个碰，这次又这样。上级真是有套办法，用着时就让发牢骚，上级最后说上几个不对承认了错误，正是上级有理、下面群众也有理，就是咱这伙村干部没理，是两块石头夹着一块肉”，“上级是烧好香哩，咱是在下边下冷蛋哩”。¹

作为县委土改整党政策的传达者和实施者，工作队干部显然是村干部消极躺倒的重要根源，他们的训斥、责骂、批判、质问给村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思想压力，一些人甚至因此而产生自杀的念头。颇具意味的是，工作队干部在整党工作中秉持的态度、方式方法是整个土改整党运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队干部因对整党的模糊认识及因“左”倾而产生的“‘左’比‘右’好，‘看上级’，上级要啥有啥”²的盲从思想及其实践促成了整党运动中“左”倾偏向的形成，而他们自身同时也受到这种机制的约束和影响。村庄干部所承受的压力其实也正是工作队干部已经或将要承受的。

一些工作队员在进入村庄时即背负着鹿家庄整党时被提高阶级成分、被判定为多占果实、被处分过重等的压力，同时也对自身将要参加的村庄整党审查充满忧虑。他们在开展工作时往往对比自身所在村庄的整党工作，因为他们也要面临和承受与村庄党员同样的遭遇。贾村工作队张根富就联系自己，“思想觉着咱回去也是得这样，……干部反正是几头圪渣哩，成斗争对象了，当干部是没好结果的，以前不该当干部，……又听说打党员、扣党员、逼党员，比对地主还厉害哩。”³漫流河工作队宋天顺“想回去听听消息，村上对自己有什么意见。到家后父亲见面啼哭，说村上给干部提意见。自己感到不该积极当干部，落后干部问题少。在

¹ 《陈政委大会动员干部的思想情况》（1948年5月），A1-1-454。

² 《参加地委办公室研究民主整党实验村会议记录——整党问题座谈》（1948年10月15日），A1-1-75。

³ 《潞城县五区贾村工作组党日检讨记录》（1948年4月26日），A1-1-1079。

工作岗位也感到哪（儿）干部积极负责对哪（儿）干部意见多，想不通，有回家的想法。……又听到对我意见不多，想可能不怕，又想可能时候不到，常常犹疑不安，不定哪天回去过关。”¹

干部中间传播着党员干部各种挨打受辱的消息，如二区成立了人民法庭打好党员，让干部给贫雇拉粪，有某区三个村庄来回轮流扣党员；一个八年的中农老党员李春生被群众打了一顿后，将家封锁赶到门外，沿街乞食。积极党员周来运被群众打晕后用凉水唤醒。²这些真假难辨的流言更使党员感到恐惧担忧，甚至有人表示“打死我也永不相信共产党了”³。“干部是牛，走得快了打头，走得慢了打尾，不走送到杀锅上杀肉。”⁴当干部没好处、没前途，倒霉，担心犯错误、挨打，这成为基层干部所处环境和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

除此外，工作队干部还需要面对上级县委对于土改整党工作的责问，在纠偏后也要遭受所驻村庄干群的质疑，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受到威胁。一些区干部认为“一张嘴不能说两样话”，无法公开宣传上级的纠偏政策和划阶级标准，一味迁就群众。尽管县委公开检讨错误并承担产生偏向的责任，但作为具体执行者的工作队干部需要直接面对村庄干群，不免要承受“出尔反尔”的道德指责，尤其是面对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如刨坟案等进行认错检讨，压力可想而知。

不仅工作队干部本人，其家庭也在村庄受到排挤和歧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无法获得帮助，由此使家庭困难更加凸显。张庄工作队员梁计虎在党日生活中提出：“家里的土地没办法种，但又增加了十分负担，有牲口但找不到合伙，没有人和自己互助，又雇不上人，……村上只给代耕三亩麦地，还想有个叔父可以帮助，又听到叔父不管，是怕村人说走干部路线，不帮助我。”⁵韩金明也发牢骚道：“韩丙仁威胁我去年互助的那一家说我是垮台回来的，你不能和他互助，……给我姊妹捎几件衣服，被村里几个人挡住不让去，说是倒粮食，当时自己感到村里当对象办，不让任何人帮助，没人给互助，怕说走干部路线……村里工也不帮。”⁶同时，“左”倾偏向也激化了工作队干部的家庭矛盾。桑科则抱怨：“老婆找到我说，以前你是放牛娃，家里很穷，现在你当了干部，我想好好的过吧，听说要孤立干部，那还不如地主哩，我要和你离婚。”⁷

整党中较高的工作要求和由此凸显出的能力、素养相对不足也是区干部悲观和畏难的重要根源。许多人因被调离原来熟悉的工作岗位，而且需要下乡参加土改工作队而犯难，甚至产生抵触心理，他们不仅要面临新工作的挑战，机关工作

¹ 《潞城县漫流河工作组过党日笔记》（1948年4月27日），A1-1-703。

²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潞城县东关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年4月26日），A1-2-111。

³ 《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年9月3日），A1-1-241。

⁴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⁵ 《潞城县张庄工作组党日生活记录》（1948年4月26日），A1-1-1009。

⁶ 《潞城县张庄工作组党日生活记录》（1948年4月26日），A1-1-1009。

⁷ 《潞城县漫流河工作组过党日笔记》（1948年4月27日），A1-1-703。

的轻松及津贴待遇与下乡工作也存在落差。有干部认为“下乡工作不如在机关舒服，没有事就休息，有事就干干，也不考虑什么，也不负什么责任。”¹更重要的是，土改整党对区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出一定的要求，他们需要宣传并动员干群执行党的土改整党政策，并将实施情况汇报县委，由此需要具备一定的思考、表达、读写和组织动员能力。许多人因被推举到领导岗位或需要做动员工作而犯愁。东关王有才提出自己原本在矿山工作，鹿家庄整党后上级将工作调到行政岗位上，不乐意，不愿干，“要叫当一般区干部没什么，叫担任领导心里发愁，怕干几天又回家，还不如不干”²。许多人因看不懂文件、写不了汇报材料、缺乏有效的动员方法而苦闷压抑，因而产生回家思想。李文虎检讨自己离职回家的原因：“在工作岗位告假回家四个月，病好后半个月多了未来，写信也未来，主要原因是干不了工作。出来时就背个包袱，一个瞎字不认，仇（愁）的没法工作，给了咱文件看不懂，因不识个字，到岗位上还不是一个村，分好几个村，今日要这个材料明日要那个材料，咱也闹不了，没法干。”李三肥是工人出身，行政工作能力远远不足，调村庄工作队时“愁得哭了一顿”，“贫雇为骨干”一冬天没弄懂，身体从小就经常有病；申乾周想天天吃的公家、穿的公家，连个干部会也不敢开，没告假就回家去了。³“五区张黑孩是个敢斗地主的积极分子，刚提武委会主任就去参加整党，分配他到二区的村庄工作，他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说‘吃公家四十四两小米的话也吃不了，不如回去’，就马上回去了。”⁴如果说许多干部对于工作中的最低要求感到为难，那面对纠偏后党所提出的不能片面维护贫雇利益、必须团结中农，对待群众避免包办代替和尾巴主义等的路线和方法要求就更加迷茫了。

回家的消极思想在工作队干部中普遍存在，即使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也消极动荡，犹豫不定，“工作是等时间，一旦调动即要回家”。“下去群众反对，要实行民主，上来县开会就是批评，不是‘左’倾错误就是右倾错误”⁵的夹缝生存成为工作队干部的普遍状态。

三、为革命还是为自己

除了整党打击与对干部工作的严格要求外，现实考量是基层干部消极对待工作甚至离职回家的根本原因。

获得土地、房屋是许多人参加革命的直接动机。面对革命胜利和整党中的严厉审查，尤其是群众获得土地后的努力生产和自家新增土地无人耕种的无奈，许多区干部产生回家生产的思想：“翻了身就算革命成功了、有土地我就

¹ 《潞城县靳村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年4月26日），A1-1-1070。

² 《潞城县东关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年4月26日），A1-2-111。

³ 《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年9月3日），A1-1-241。

⁴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⁵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应该在家里弄生产”，“不愿南下，革命成功了，再革命家也保不住，看见群众发家自己眼红。”¹黄碾工作队乔光炎“回家见到家有困难，老婆诉苦……说自己不管……又想到农民都翻了身，咱家没有什么，一天不如一天，觉得自己不如个老百姓好。”²崔圪堆检讨自己的思想：“常想起家庭来没有办法，连个灯油也没有，常想还革命呢，把自己也革住了。”³王六则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四五年潞城解放后又调到边沿区工作，提出“对敌斗争就光该我干？我已十来年了，也该我在家歇歇哩。”⁴在照顾家庭、满足家人需求、回家搞生产与干革命工作之间进行摇摆和利益权衡，这种思想在区干部中比较普遍。

应该说，尽管不乏有的干部为了制造离职回家的合理性而夸大自身困难，但干部的家庭困难真实存在。许多干部是新翻身，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和牲口。成年劳力尤其是兄弟相对较多的家庭稍好些，在兄弟姐妹多且年龄尚小的干部家庭中，劳力缺乏的问题突出，且不论老人，牲口以及年幼的孩子即无人照料。黄碾工作队邢引来诉苦：“往鹿家庄学习走时老婆疯傻病着……学习两个月回来后她还在病着，……心想革命倒好，把家一遭革完了才糟糕，地也种不上，老婆病也不好，小孩没人管、兄弟小，代耕组也不好好帮助。”⁵东关工作队王福则提出：“自己出来本就不愿意，家里一个母亲没有父亲，就我一个儿，……我母弄两个小女不能干，经常哭，……我娘没办法解决……思想是土改后要回家哩。”⁶“我能离开党不能离了娘，我是娘养大我来，我又没有沾新社会光，只自由结了个婚，……每天在工作中经常数、算哪时回去呀。”⁷正值青壮年的区干部离家工作使家庭缺乏劳力的困难凸显出来。

县委并非没有意识到干部的困难，在四月会议时即提出要解决代耕问题⁸，但之后宣布取消干属代耕，后来又命令恢复。⁹政策的反复造成实施中的困难，再加整党后期群众产生极端民主倾向，村庄贫农团否认干部功劳，村庄管理松散，代耕工作多潦草从事，基本没有展开。¹⁰区干部认为“代耕捉乎人”，“代耕是人在人情在”。¹¹张庄的侯宝贝、李文忠即因此而回家搞生产，种上地后再回到工作岗位。¹²代耕工作一直未能有效开展，直至四八年十二月“县领导上决心整理

¹ 《（潞城）八月县区扩干会给地委的报告》（1948年8月29日），A1-1-208；《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年9月10日），A1-1-1091。

² 《潞城县黄碾工作组组织生活检讨》（1948年4月26日），A1-1-810。

³ 《潞城县新村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年4月26日），A1-1-1070。

⁴ 《集训回家干部思想情形总结》（1948年9月20日），A1-1-239。

⁵ 《潞城县黄碾工作组组织生活检讨》（1948年4月26日），A1-1-810。

⁶ 《潞城县东关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年4月26日），A1-2-111。

⁷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⁸ 《陈振华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的报告》（1948年4月28日），A1-1-438。

⁹ 《潞城县扩大干部会议总结》（1948年6月26日），A1-1-247。

¹⁰ 《区干部集体过生活干部思想问题》（1948年10月13日），A1-1-238；《（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潞城县秋后第一批结束土改总结报告》（1948年12月），A1-2-651。

¹¹ 《区干部集体过生活干部思想问题》（1948年10月13日），A1-1-238。

¹²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代耕工作，并有了布置计划”。¹

除了家中缺乏劳力、雇不上劳力的忧虑，一些干部也深受疾病的困扰，这加重了他们的悲观情绪。九月返回工作岗位的 30 名干部中有 6 人有病，3 人即因身患梅毒而回家²。整党时一些干部因疾病想回家休养而被拒绝，在工作岗位上又得不到照顾，便产生不满、不想干、想回家的想法。³县委承诺的医药费报销问题未能解决，这使他们产生抵抗情绪。⁴张庄工作队韩金明提出“吃了九千多元药费，县里说报销，结果没报销，每年收入只有工资，生活难过。”⁵李文虎虽因自身能力不够而产生消极情绪，又患有梅毒，但上级照顾不够也是其离职回家的重要原因：“家有些药费未弄上，处分了我也不来，主要是个药费问题，不报清药费就不工作。”⁶对于本就穷困的干部，药费显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村庄工作的区干部任务繁重，压力大，难免无法保养甚至可能加重疾病，这使区干部更加悲观消极。枣臻工作队在过党日中讨论认为：“同志们在工作岗位上带病坚持工作，吃了药自己花钱是不对的，另外特殊病重者也应按上级规定适当地保健，而不应采取不理态度，否则工作是会受到损失的。”⁷

与药费报销相应，村干部的津贴亦迟迟未能落实。华北局扩大会议上曾经提出：鉴于“村干部的生活困难，拟规定每村有半个人至一个人脱离生产的津贴，用来津贴若干人，并规定一村中免除若干人数的战勤，以资调剂，使他们既能照顾家庭生活，又有力量管理村政，否则有不少干部实在是‘模范不起’。”⁸但这一措施一直未能施行，以致干部中产生“专署说了话不顶事，承认干部编制不供给”的埋怨。⁹

如果说，基层干部离开村庄到区上或者被调动到其他区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尚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南下、北上及参军的工作大调动对于干部的考验和挑战更大。由于形势发展和解放区建设的需要，干部北上、南下的调动无可避免，军队中也需要补充干部。1948 至 1949 年是“形式变化最快的一年，因此也是干部调动最频繁的一年”¹⁰。干部的大量调动使一些地方的骨干核心遭到削弱，造成一定程度的秩序紊乱和干部情绪的波动。作为家中的主要劳力而南下、北上远离

¹《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 年 12 月），A1-1-1311；《潞城县扩大干部会议总结》（1948 年 6 月 26 日），A1-1-247；《（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²《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 年 9 月 3 日），A1-1-241。

³《潞城县黄碾工作组组织生活检讨》（1948 年 4 月 26 日），A1-1-810；《潞城县五区贾村工作组党日检讨记录》（1948 年 4 月 26 日），A1-1-1079；《潞城县枣臻村工作组过党日生活笔记本》（1948 年 4 月 26 日），A1-1-1039。

⁴《潞城县靳村工作组党日记录》（1948 年 4 月 26 日），A1-1-1070。

⁵《潞城县张庄工作组党日生活记录》（1948 年 4 月 26 日），A1-1-1009。

⁶《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 年 9 月 3 日），A1-1-241。

⁷《潞城县枣臻村工作组党日生活检讨记录》（1948 年 5 月 23 日），A1-1-1037。

⁸彭真：《我们应如何执行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工作的指示》（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央档案馆等（1998）：《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央档案出版社，第 472 页。

⁹《县委会过党日记录》（1948 年 10 月 28 日），A1-1-124。

¹⁰《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 年 9 月 10 日），A1-1-1091。

家乡，土地耕种、牲口喂养、老人孩子的照料以及配偶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家庭困难、疾病带来的困扰以及对自身工作能力的担忧、对未来工作的迷茫和畏难更加凸显。

靳村工作队贾毛则“对南下先是很高兴，愿意跟上个熟人，觉着不识字就没有前途，但又怕（把熟人）调开，回来后就不愿去了，见到老人就哭，想到父亲死了再去也可以。”¹吕磐是南下跑回家的干部，他表示“家里女人生了小孩后病了，很困难，……出来也行，是不愿意走远，走了家庭实在不行”。郭喜仑检讨自己：“是去年十月间调南下回去的，当时给县委承认是再一期走。想着家里十余亩地、一个老婆、一个小女，走了没办法。咱也没出过门，到走时我就没去……当时我主要是个享乐思想，怕吃苦，所以就没有服从了组织调动。”²刘顺义因眼疾而坚持不愿南下并离职回家，表示自身“实在有病不能去，不是故意捣蛋不去，工作还愿意好好地干，不要又调南下，眼不行。”许多区干部因为怕调动、怕南下，在工作中本想积极而不敢积极，因为积极就有可能被提拔调南下，听到胜利又高兴又担心，因为“一胜利就要解放地方，一解放就要调人，一调就得走”。

3

有少数干部需要被调往部队，但他们怕参军上前线，怕牺牲。当时潞城县委一共需要调动六人，但全部未去。县委认为“如硬调的话全部都要快回去，这样只是跨了三个，没有全垮台，怕严重的不在少数，如果多调几个多垮台几个。”⁴贾双龙即表示“除部队工作外干个什么工作也行，自己的思想是一走之后父母亲是个死，老婆是个走，完蛋了，”⁵“调我到队伍上工作我不去，……领导上培养我几年算白费心了吧，我对革命未尽义务，兵也不当了，工作也不干了，就在家种地吧。”赵全如因腿疾而拒绝去部队，同样提出只要不到部队到哪里都行，并写信表示：“我对不起党与革命了，家中困难根本解决不了，……请不必挽救我了，这可对不起，我犯了党的纪律了，要求党给我处理吧，处理的轻重我均接受。”

6

综上所述，除了整编处分打击、相对较高的工作要求、对自身工作能力的担忧外，寻求稳定以发家致富的愿望、对家庭困难和生活问题的顾虑、工作岗位变更的动荡等都是干部悲观消极的重要原因。南下北上面临离开当地、与家人尤其是与妻子分离，年迈父母的照料、夫妻、婆媳关系、后代问题、外债负担、疾病困扰、参军担忧牺牲等使干部所面临的矛盾更加凸显加剧，再加县委未能对干部

¹ 《潞城县靳村工作组党日记》（1948年4月26日），A1-1-1070。

² 《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年9月3日），A1-1-241。

³ 《潞城县秋前结束土改工作给地委会的报告》（1948年11月1日），A1-2-658；《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

⁴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⁵ 《干部训练班一些干部材料记》（1948年9月3日），A1-1-241。

⁶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调动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代耕、津贴和供给问题也未能切实解决，多方因素相互交织使干部产生思想混乱，离职回家。

四、自我检讨、反对“磕头”与教育挽救

与干部躺倒问题初步凸显，并逐渐形成人数较多、影响范围较广的危险局面相应，潞城县委对于干部问题的认识及应对措施是逐渐明确和深入的渐进过程。潞城县委的五月会议扭转了土改不彻底、贫雇翻身不彻底的论断，开始纠正土改整党中片面打压干部等的诸多偏向，对于后期整党的方针、目标、方式等逐渐清晰，但未能较为全面具体地分析干部躺倒问题，尤其是未能触及干部思想混乱的核心及根源。这与土改、整党及由斗争向生产、由消灭封建向组织起来开展生产建设的转型，以及因革命形势发展而引发干部调动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关。直到八月，潞城县委才开始结合上级党委的指示系统深入地分析干部躺倒问题并逐步予以解决。

面对干部情绪消极以及离职回家所造成的困境，潞城县委反对“磕头”式的检讨，即不做具体分析、一味向离职回家的干部无原则、无条件妥协，并明确提出：由于过去领导上出了毛病的由领导上纠正问题，县委要作认真的、诚恳的自我批评；如是（干部）个人的原因，要用最大的努力提高其政治觉悟，但对真正不觉悟、不认识自己错误的个别同志，绝不能松懈党的组织性和放弃党的纪律性，制造党的混乱。¹这为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设定了基本基调：方向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由县委承担责任，但干部个人“多占果实、行政命令、流氓腐化等应该由干部自身负责”²，毕竟这些都切实存在。而且试点村的整党显示，党员们入党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动机，不乏盲目性、功利性和投机性。

为了挽回离职回家的干部，潞城县委以各种方式进行劝解，工作不可谓不细致，“大部同志经县委写信去叫过三五次，区上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对个别进行谈话教育，“尽够领导上的责任”，做到“仁至义尽”，显示出“党是实事求是，对同志认真负责，真正是挽救教育的态度”。³这对一些干部的触动较大。宋天顺写信给县委：“你们来信，我已收到。信上说县里开会让我去，是我因为家庭观念很是愁，但也是家庭困难很多。第一是父亲不能劳动，还得人伺候。第二母亲和媳妇不大团结。第三家里喂的牲口无草也无料，又无有人喂，在我家里种的四十多亩地，无人种，也推不了。根据家情况，自己思想落后，有退休思想，但是思想又考虑了一下，还想为群众服务，现在叫我去参加会，我还是这次去不了，在阴历八月初二就可以到工作岗位上。”但也有干部

¹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年2月27日），A1-1-267。

² 《潞城县区村扩大干部会议动员检查“左”倾纠正偏向综合材料》（1948年5月24日），A1-1-995；《潞城县扩大干部会议总结》（1948年6月26日），A1-1-247。

³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在经过动员后仍然不改初衷。魏尽忠在信中写到：“这次调我去学习，我搞不通。家内无劳力，母亲六十岁，不让我走，叫我放她一个地方，现在无有办法，另外我的革命人生观未有确定。根据以上情况，我的思想落后，不去学习了，希另调一个吧。”在另一封信中，魏提到“我信说的那些话也是为了我自己，现在检查起来只能怨自己落后，主要是自己思想不纯，关于我的革命生命问题想起来也难过，我的思想是愿在家里种地，但这想法是不对的，应受到党的严重处分，不过请你多加原谅。”

为了进一步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潞城县委的八月大会以王甲寅作为典型展开讨论。王甲寅由于县里不准结婚而产生对抗情绪，不服从调动，也未获得提拔，于是利用反“左”纠偏之际到处发牢骚。县委认为王的本质是好的，但以农民的“封建”观点来看待党、看待党和群众、党和个人、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虽犯的错误不大，但在干部中影响不小，如他认为国家是十万里江山，国家对干部的谈话挽救是三请诸葛，党员自由受限制不如群众等。县委为了扭转其个人思想并教育更多干部，对王甲寅进行了集体谈话。王受到很大触动，在大会上承认自身对于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矛盾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并完全同意县委的处分决定。¹应该说，王甲寅关于个人与党之间的关系、党的纪律要求的认识和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次会议上关于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及矛盾等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对于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具有推动作用。

八月会议上除了专门讨论王甲寅的问题外，县委还宣布了对干部的复审处分结果和提拔配备决定。会后一些干部的混乱思想逐步得到澄清，“一般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基本安定下来，能积极工作，责任心加强了，好回家的干部也少回家甚至不回家，开始停止了躺倒现象，整个干部问题基本上逐渐走向好转，但干部情绪不太稳定，仍是问题，是‘琉璃圪奔’，经不起风吹雨打，未起来的干部仍需挽救。”²

事实确实如此。一些干部离职后县委、区委三番两次派人去叫仍无济于事，他们躲避着不见县区领导的面，甚至走路不敢经过区公所的门。一些干部回信说“自己犯了原则错误，不服从组织，但实在困难，组织上争论也无用，人生观已确定在家了，组织上给什么处分都满意”，也有提出给解决了困难就出来工作。³县委承认这与干部的实际困难、土地代耕问题没有解决有关：“他们一般当了干部后家庭增加了些困难，多数是缺乏劳动力，特别某些干部家庭是十分困难的，但一般的都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真正困难的干部的情绪低落甚

¹ 《（潞城）八月县区扩干会给地委的报告》（1948年8月29日），A1-1-208；《（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² 《潞城县秋前结束土改工作给地委会的报告》（1948年11月1日），A1-2-658；《潞城县扩干会议的报告》（1949年1月10日），A1-1-258。

³ 《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

至躺倒”。¹不过，一些相对较富裕的干部也受到影响，借口翻身后的困难而离职回家，实质是革命意志的退化。李忙狗与妻子不和，在组织生活会上曾表示“想到家庭困难，弟都牺牲了没人种地，又加死了个小孩没有人管……最近想要是调南下是垮台不行”，但实际上他翻身后有楼有房，有半个骡子、四十余亩地，有大车织布机，家里两个劳力，哥30岁，弟16岁，妇女劳力三人。区分委书记亲自去动员，遭到全家“斗争”，说这困难那困难，“工作有什么前途，将来算个啥。”县委认为李忙狗并不算困难，否则像这样借口翻身后存在困难、没有劳力不能工作而回家的占很大部分。²

可以看出，农民意识与党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土地问题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革命在乡村的实践一直围绕着土地斗争展开，当地主阶级被消灭后，乡村要转向生产建设，而非斗争，革命走到了十字路口。对于农民干部而言，获得土地后努力发展生产就成为首要选择。但是，贫苦农民如何避免再次受到剥削，农村如何避免再次陷入两极分化，这是党在土改完成后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潞城县委认为“党需要引导农民走向合作经济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此农民才能免于贫困。”³党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是干部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方向指引，即需要群众进一步的支持、努力和积极参与，更需要基层干部的组织动员和协调管理。不过，相比于“打土豪分田地”，基层群众尤其是干部对于党的“组织起来生产建设”的新方向，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前途”这一理论和政治问题显得尤为陌生，这需要党对干部开展进一步地动员和教育工作。

五、澄清思想、划清界限与继续挽救

除了对整党“左”倾偏向打击的抱怨、只顾个人发家而消极对待工作甚至放弃革命、不明了革命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及目标而意志衰退外，基层干部中还存在着其他两种混乱思想——否定整编和抵抗纠偏。

有一部分干部抓住土改整党中对干部不实打击的偏向而全面否定整党。潞城县委清晰界定整党对于纠正干部의思想和作风的意义，明确肯定整党成就，并将否定整党的干部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本质不纯，完全为了个人的目的，钻纠偏的空子，发牢骚，无理取闹，推卸责任，仇视整编中对他提意见的同志，甚至传播反整编、反领导的言论；第二种人，本质虽好，但缺乏组织锻炼，经不起党内斗争，受了些批评或处分，或由于处分不恰当，思想不通，背了包袱；第三种人，原则性低，对整编后党内所发生的混乱状态缺乏分析能

¹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

² 《（潞城县）九个月干部材料综合报告》（1948），A1-1-402。

³ 陶鲁笏：《目前干部问题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48年10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2013）：《陶鲁笏文集》（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0页。

力，笼统归过于整编，分不清整编的成绩和偏向，对第一、二种人常常表现无原则地同情和调和妥协。”潞城县委对于干部否定整党思想的分类具体而客观，这为试点之后继续全面系统地整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整党的意义显而易见，纠偏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有的干部认为承认错误并予以纠正，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党的合法性面临威胁，并产生混乱，因而拒绝、抵抗纠偏，并主张以行政命令方式处置回家的干部。潞城县委认为这部分干部“看不见偏向的存在及危害，或者承认有偏向但是怕麻烦，怕党内愈纠愈乱，因而忽视纠正整编中对干部的错误结论与处分，忽视党员的民主权利，忽视领导者必要的、适当的自我检讨，忽视热情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潞城县委开诚布公的勇气可嘉，这也是自晋冀鲁豫边区至驻村工作队干部的整个官方体系，对于土改整党产生的偏向予以责任担当的具体体现。太行区党委的思路同样客观而理性，认为如果有偏不纠且采用强力压制，必将造成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要求干部明了党对整编的基本方针是“团结、改造、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明确纠偏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而非否定整编的成果，是为了提高干部的觉悟而非迁就干部的落后，如果有偏不纠就会使党内是非好坏不分，党的纪律就无法维持，干部的觉悟也无法提高。¹潞城县委和上级党委对于原则性的坚持是继续开展整党工作、进一步澄清干部混乱思想的重要前提。

不过，干部的消极思想并不容易彻底扭转，在具体管理方式上的妥协既显示出党的灵活性，也侧面体现出干部问题的严重性。潞城县各区对于回家干部“叫谈话叫不来，找去又不见面，见了表示不再干”，区领导也没办法，只好采取让步政策，“怕调动就不调动，出来干就行”²；“对于随便脱离工作岗位回家的干部，只要回来就不敢过于责备，以争取其继续工作”；对于干部强调实际困难、放置工作去解决个人问题如看孩子、割麦、秋收等“自由主义”的行动“顺毛”来，只能“一般地提一提不对”。³也有的干部被民兵“捆”回到工作岗位上。⁴妥协的方式使党的权威性遭到削弱，激烈的方式又加重了干部的悲观和抵抗情绪。“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有的因此躺倒不起了，也有二次躺倒的，也有受影响准备再次躺倒和向领导提无理要求的。”⁵

干部问题确已形成严峻困境，威胁着中共政权，不仅思想混乱的邪气普遍弥漫，而且核心领导也遭到削弱。潞城县委将干部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¹《给华北局组织部的工作报告——关于华北局七月会议以来的干部工作》（第三号）（1948年11月5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9）：《党的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16页；陶鲁笏：《目前干部问题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48年10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2013）：《陶鲁笏文集》（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9页。

²《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

³《潞城县秋前结束土改工作给地委会的报告》（1948年11月1日），A1-2-658。

⁴《区干部集体过生活干部思想问题》（1948年10月13日），A1-1-238；《县委办公室小组检讨材料》，（1949年2月20日），A1-1-272。

⁵《潞城一区干部问题研究》（1948年12月），A1-1-1311。

类，对党、革命比较坚定，经得起锻炼，是积极认真的骨干分子；第二类，锻炼差、觉悟低，对上级有意见，担忧家庭，认为革命成功了，再革命家也撑不住，看见群众发家自己眼红。他们愿意坚持革命，态度认真、积极，只是在革命转变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只看到当前利益，看不到革命前途；第三类，投机分子，利用革命发财、利用缺点反党，往往抓住领导上、工作上、群众中、政策执行上的某些弱点来反对整党，趁机回家。县委认为由于第一类骨干太少，第二、三类干部的思想未能完全划清，在组织界限上纠缠在一起，第二类干部同情第三类分子，所以对于二、三类干部的区分和斗争的时机并不成熟，于是便有意地迁就，一面对第二类干部教育提高，一面在工作中暴露第三类干部的真相。¹这也是八月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面对敏感的情绪、心理和思想问题，策略性的应对及时且必要，其解决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

到 1948 年 12 月县委往北平调干部，结果一大半不服调，颓废思想仍然较为严重。“在村庄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区干部有的在支部整党时不敢和党员说前途问题，不敢讲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决议，他们因为自己已无前途，所以不敢和别人谈前途，因为自己怕调动，就不敢和别人讲服从党的决议。”如此对整党及党员和群众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局势不容乐观，适时地教育干部了解认识革命前途、澄清是非好坏、对投机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已迫在眉睫。为了彻底肃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明确整党的目的及意义，县委于 1949 年初召开了元月会议，明确揭露了第三类分子的本质及其危害，甚至进行点名揭发，同时组织在职县区干部、新提拔的干部及回家干部共约 200 多人进行历时半个月之久的时事、生产、前途、党纲和党章的党员部分及第一批整党村的经验总结等的学习和讨论。

相比于八月会议的迁就与模糊处理，这次会议不仅明确批判了躺倒、妥协、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干部思想和状态，而且也使干部明确了未来道路的方向及自身责任——组织起来发家致富，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革命工作。除此外，县委还坚决处理了九十多个妥协干部，并组织了卸任干部的欢送。²政治理论和政策的学习、对投机分子的清洗整顿及仪式性的欢送会提升了干部的思想认识，也严格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扭转干部心态。

在北上南下的工作调动上，县委组织了专门训练班进行动员，一些干部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一直坚持己见、始终不愿服从调动的史富才检讨自己：“党是三次五次地挽救，咱党对咱是好的，咱是对不起党。……共产党员不服从党的调动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是开除党籍。不过过去错了，今后好好地

¹ 《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 年 2 月 27 日），A1-1-267；《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 年 9 月 10 日），A1-1-1091。

² 《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 年 2 月 27 日），A1-1-267。

工作，调到哪里算哪里。”赵全如和贾双龙一直坚持只要不到部队到哪里工作都行，经过组织动员、参加训练班学习，思想发生了扭转，表示“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说工作，由组织决定就对了”，“如就要叫去部队上，我这就去，一定不行我只有服从组织调动好了”。最终两人都因工作需要而被调往部队。干部们最终服从南下调动的共43人，经过学习坚定了南下思想的共49人，之前不愿南下、经过学习后可以接受调动的27人，在学习后也知道有前途但仍不同意南下的共6人。¹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潞城的干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1949年9月的干部分类表中，思想坚定、积极主动，提高大、进步快，成绩也大，组织性、纪律性强的县级干部有54人，区级干部有35人；能服从组织调动，但工作能力差，遇到困难无办法、就苦闷的县级干部95人，区级干部84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阵营内钻空、破坏党的纪律的县级干部14人，区级干部25人。总计县级干部163人，区级干部144人，共307人。²虽然仍有12.7%的投机分子存在，但态度积极的干部占到29%，能力弱、但能服从调动的干部达58.3%，相比于之前回过家的干部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干部的消沉状态。就村庄干部而言，据潞城县14个实验村的统计，在416名党员中，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的55人，占13.2%；积极工作但作风不好及被认为是有点缺点的好党员244人，占58.7%；老百姓党员不做工作、不起作用的占25%，被认为带流气的流氓蜕化党员13人，占3.1%。³可以看出，村庄党员中积极工作的占71.9%，他们的状态也得到了较大扭转。

潞城干部问题的解决既显示出县委挽救干部的不懈努力，也反映了县区村干部积极的内在自我转变，体现出党的意志与农民意识和行为习惯的矛盾交织。

六、结语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整党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通过整肃干部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最后的彻底变革，莫如说是以土改为路径依赖、通过对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中共干部的严厉整顿和审查而实现干部队伍的全面建设，从而以干部为桥梁达致深刻改造社会的目标。不能忽视的是，此次土改整党是在中共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治竞争中即将获胜、解放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干部面临工作大调动的背景下展开，并且与中国社会由战争转向和平，由斗争、消灭封建转向生产、建设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这既挑战着中共教育管理干部的能力与方法、智慧，又是对干部的思想观念、立场作风、能力品质、理论认知、政治

¹ 《元月全县扩大干部会的学习向地委的报告》（1949年2月27日），A1-1-267。

² 《潞城县委关于秋季生产、互助组织、支部建设、干部缺编、卫生、案犯处理工作的总结》（1949年9月10日），A1-1-1091。

³ 《潞城县十四个实验村支部基本情况调查表》（1948年11月），A1-2-557。

素养的全面检验，凸显着党引导改造农民干部的可行性与途径，和可能出现的倾向、局限、弊端。

干部离职与党的判断发生偏向、整党“左”倾打击不无关联，但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是，干部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诉求、革命意志的衰退及对社会发展路径、方向的认识模糊不清，其实质是干部的需求、观念、态度与中共的革命方向把握、道路设计之间的差距。中共从组织、纪律、政治觉悟、民主作风等方面对党员进行教育改造，尤其是面对干部“干革命”与“为自己”的矛盾冲突，以革命的理想、信念和道路发展引导教育基层干部，争取其对革命的支持参与及牺牲奉献。从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区党委至潞城县委、土改工作队的承认失误、责任担当、思想澄清等，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也需要在干部已经消极躺倒的状态下对涉及干部心理、情绪和思想的敏感问题予以策略性应对，中共以坚韧、诚恳、相对开放包容且不失原则的心态来挽救干部，确属可贵。

有学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在整党中，试图把自己超脱于干部和民众之外，成为双方博弈的仲裁者，这是中共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的重要努力。”¹中共坚持群众监督干部、对干部形成权力制约，的确是中共坚持民主理念的重要努力，但如果说中共试图超脱于干部和民众、仲裁双方的博弈却似不妥当。面对土改整党的判断失误，中共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公开、深刻的自我检讨、责任担当，以及为反“左”纠偏和挽救干部作出诸多努力。就此而言，与其说中共将自己置身事外，为控制乡村社会而发动群众监督干部，莫如说中共将基层干部看作为自身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借助群众外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来改造干部，于此建立干部队伍并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在观念、态度和行为上产生了偏向的基层干部也逐渐发生了改变，逐步接触和学习、认识党的政策、道路发展及党对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这为中共后续由斗争转向结束土改、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

潞城县干部躺倒问题的解决显示出，革命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超出了我们所具有的想象，对此应有更充分的认识。面对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和课题转换，中共相比于纠“左”之前所具有的冷静思考和对具体史实的分析、把握，值得称道，也令人唏嘘感慨。

项目来源：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华北社会调查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DJ016）和2022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中共党史与党建》课程教学质量路径优化研究与实践”（项

¹ 黄道炫（2013）：《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近代史研究》第3期，第42页。

目编号：）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邓宏琴 女，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在研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级项目多项，在《开放时代》、《读书》、《安徽史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马维强 男，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根据地社会史、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开放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代表作《双口村：集体化时代的身份、地位与乡村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